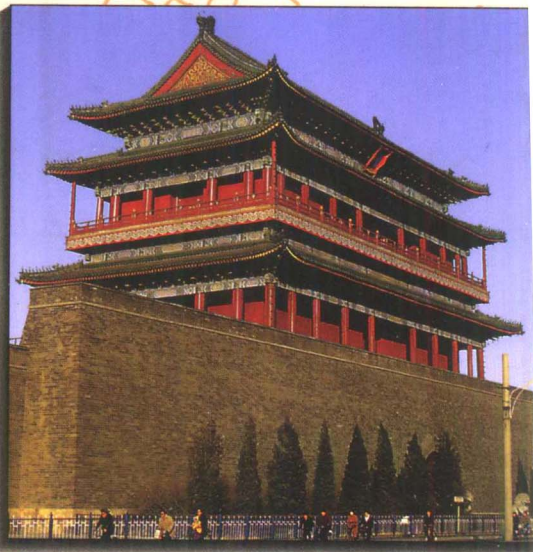


史念海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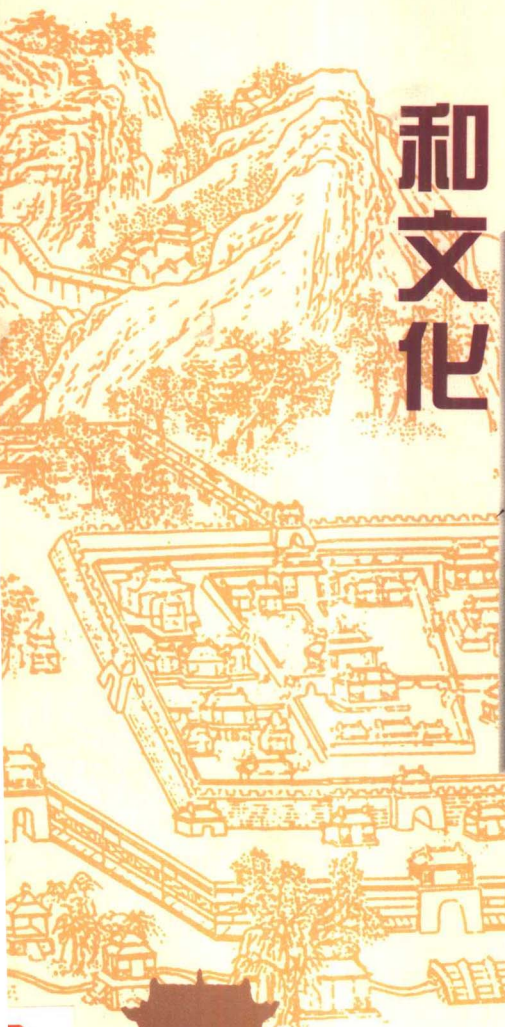
中国古都

和文化



ZHONGGUO GUDU
HE WENHUA

中华书局



中国古都和文化

史念海 著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都和文化/史念海著, —北京:中华书局, 1996
ISBN 7-101-01585-9

I. 中… I. 史… III. 都城—演变—中国—古代 IV. K928.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19614 号

责任编辑:杨 华

中华书局出版发行
(北京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173/4 印张·1 插页·395 千字

1998 年 7 月第 1 版 1998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4000 册 定价:26.00 元

序

城在中国历史上是一种文化的象征。它在最初的作用，主要是为了保护人民生活与生产的安全。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到奴隶制国家的形式出现时，它便初步具有了一国政治、军事和经济中心的性质和作用。具有这种性质的城，便和一般的城有所区别了，于是便又有了都的名称。都就是头，而头在人来说是人的神经中枢，巍然高耸，气象峥嵘；发纵指使，都在于头。所以到了大一统的封建制国家成立时，便就有了都城和选择、营建都城的重任，都城在全国的地理位置和形势，以及其建制规模，都关系着一代王朝的盛衰。建都既与一代王朝的盛衰有如此重要的关系，则对现代的人民国家来说，怎样法古通今，探讨历代古都兴废的自然规律和人为因素以及古今形势的演变，借以鉴往知来，因革损益，把人民国家的首都，建设得适应于当前社会发展和今后改革开放的形势，符合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和统一国家的格局和气派，是当前古都学所以酝酿兴起和其为人所重视的缘由所在了。

城在中国，起源很早，《吕氏春秋》和《淮南子》都记载了“夏鲧作城”的传说。而《吴越春秋》更具体说：“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居人，此城郭之始也。”不论筑城是否始于传说中的夏代，但就殷商自契至汤凡八迁的记载和遗迹来看，此前氏族社会的聚落已有土堡村寨，则并无可疑。古籍所载夏鲧作城云云，当系殷商时代史迹的一种反映。前面我已谈到城是一种文明的象征，自从1928年中央研究院在河南安阳小屯村进行考古发掘，发现了殷墟以后，其实物

证明殷商时已有了高度发达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的中心。殷墟是商朝后期的建都所在，而据此后发现的偃师二里头文化，则又比殷墟为早。其更重要的一点是在偃师的尸乡沟又接着发现了一座古城遗址，有人推测这很有可能是商汤的都城西亳。比这座古城遗址更为弘阔而又具备大型宫殿建筑群的古城遗址，则为发现于湖北省武汉市北五公里处的商代中期盘龙城遗址。据测察这座古城垣南北约 200 米，东西约 260 米，是属于宫城性质的城堡，城内东北部距北城垣 10 米处，发现属于上层文化的宫殿基址三座，其中一座建筑在高约 10 厘米的夯土台基上，中为四室，外有迴廊，四周有台阶的四坡重檐茅顶大殿。这座宫城遗址，比郑州二里头商城，具有了上层文化建筑的宫殿基址三座，其时代当与安阳殷墟相先后。由此可以推见作为商代晚期的都城，当比这座宫城更为弘伟。那么，城作为文明的象征，早在夏商时代业已逐步形成，而都城作为一国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军事活动的中心，则到商末已可说是灿然具备了。安阳之所以被列为中国七大古都之首，并不在于它山川形胜，地理环境优越，交通方便，物产丰盈等方面，可比此后的长安、洛阳和北京，而是它在古代先民从聚落、城堡发展而为一国都城，在经制上已超越了“民保于城”仅备防卫的阶段，而为后世都城规划设计的“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和宫隅城隅的张本。其更重要的一点则是文化的积累，如鼎彝为王朝的重器，甲骨为大事的纪录，人殉为奴隶制的遗迹，祀天为宗教的滥觞，皆足征当时社会发展的脉络和特点。而彩陶、黑陶制品的大量涌现，更可上溯中国文化的缘起和演变。这些炳炳琅琅、灿烂辉煌的文化积淀，都荟萃于都城，既说明都城虽同样为城市，而又与一般城市大有区别，不仅古代国家的职能在都城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尤其应当重视的是它在一国文化发展史上的积淀与融通作用。

中国古代王都的规制，以宗庙、宫殿、市廛所组成，所谓王宫当途之经，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经营，一直相沿到明、清，大致因仍未变。欧洲中世纪大城，也多以教堂为中心，为宗教活动所在，略同于中国的左祖右社，其商业和军事性质，则完全与中国王城相一致，由此也可以略观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共同轨迹。中国古代的王城规制，当以周公所建的洛邑为最典型。以一国文化的发展融通为经，而以古代都城的规制为纬，当为史念海先生倡议建立古都学的用意所在了。

读史的要义，在知兴亡，而由探寻古迹以激发爱国思想与感情，是历来有志者经邦治世的一大端。所谓过秦汉之故都，发思古之幽情，如佚名《三辅黄图》、顾亭林氏《历代宅京记》、徐松氏《唐两京城坊考》诸书，都是这种表现的名著。中国沿革地理这门学科，源远流长，是一门介于历史、地理两科之间的特殊学科，历代著作从《山海经》、《穆天子传》到《水经注》、《大唐西域记》，是由有关地理传说发展为实地考察记录的名著；从《禹贡》到历代诸史地理志以及元、明、清三代的一统志，加上《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輿地纪胜》、《方輿胜览》、《寰宇通志》，都是历代官修的总志。而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规模弘大，考订精审，尤集地方志的大成；我们更从清代王谟所搜辑的《汉唐地理书钞》中，得睹诸凡名山、大川、古都的单篇记载，如《庐山记》、《九江记》、《雍州记》、《三秦记》、《长安记》、《洛阳记》等，则都是上述地理总志的先声，而古都志也已初露端倪了。

历史地理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是现代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的沿革地理，原为史学的附庸，通过地理总志的辉煌发展，加上研究中国古代都城的专著和《历代輿地图》的绘制，到本世纪三十年代由顾颉刚先生发起成立禹贡学会，发刊《禹贡半月刊》，便

正式揭橥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名称和定义。至此遂使尚是历史地理初步阶段的沿革地理,发展而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地理学了,这实是顾先生和当代中国历史学家的一项创获。

史念海先生,早年从顾先生与谭其骧先生学,即治中国沿革地理,有《中国疆域沿革史》之作。后到禹贡学会工作,得读张国淦先生《中国古方志考》全稿本,也就很自然地把沿革地理学与方志学接轨。古方志中如韦述《两京新记》和宋敏求《长安志》,又独详于都城的记载,并把唐皇城与唐京城分别为部。宋氏并追叙在隋以前,皇城建制并有人家在宫阙之侧,隋文帝以为不便于民,于是皇城之内,唯列府寺,不使杂人居止。由此可知隋唐以还的皇城规制布局,有了新的设置,这又把方志与都城联系起来,这就是前面已经提到的《历代宅京记》与《唐两京城坊考》两部名著产生的由来。事物和学科的演变与发展自有其内在的规律,要在于豪杰之士的继承发皇与创新罢了。史先生刚从事地方志的研究工作,抗日战争便发生了,他随之辗转于关陇之间,曾有评述汉初议都长安之作,是他对古都研究的发端。其后流寓北碚,在顾先生指导下又有《中国的运河》之作,这就更需要从事野外实地调查。抗战胜利后,他原工作的国立编译馆复员回京,他暂留在北碚修志馆内,我于那时应顾先生召,助理《北碚志》完稿结束事宜,便有缘与他结识,也与沿革地理学与方志学相接触,更很钦服他的做人与为学。其时兰州大学已在辛树帜先生开创下正式成立,我们两人先后应聘到兰大历史系任教。随后顾先生来兰大讲学,并成立中国边疆学会西北分会,在兰州《和平日报》上创刊了《西北边疆》周刊,我便开始在该刊上发表有关西北史地、民族、宗教和民俗的文章,既与地方史志有联系,也与古城、废址、沙漠、水道、河源的考察相接触了,其间多蒙顾先生与史先生的指导和诱发。

1951年初,顾先生在沪撰写《昆仑传说与羌戎文化》,我应约以任诚明文学院教职名义去沪,即寓武康路顾先生处,得读先生已撰成诸篇,并时与讨论。先生于昆仑传说,颇采苏雪林说,我则以为《禹贡》雍州地名,如昆仑、析支、渠搜等均译自羌语,均可由今藏语方言查实其地的所在。就此来说,传说中昆仑主峰,实即今巴颜喀拉山(阿尼玛沁)。现代语言学上所说汉藏语系,实当为汉羌语系。昆仑、巴颜(燕),当前均归诸阿尔泰语系,实际上吐蕃族与蒙古族进入青藏高原,在中世纪以后,因此羌族为青藏高原土著,且早于商、周时进入中原,因而雍州地名和汉、羌之间的称谓,也多从羌语译音。除《禹贡》所录外,如《山海经》西王母,“西”属方位词从汉语,“王母”则从音译属羌语,义同女王。又如“华夏”之称,也从羌语译来。顾先生听后,殊感新颖,嘱再查《广韵》与顾亭林氏《音学五书》等加以论证。我在翻查上述有关诸书后,发现《唐韵正》谓“下”(xià)读如“户”(hù);黄侃氏谓“夏”古音有“亥雅”、“亥驾”、“举下”三种切音。我于是理会到,这即是“华夏”这一称谓为羌语音译的确证,因今西北汉语方言“吓”(hè)与“户”(hù)声同,而吴语今又读“吓”(xià)为“倭”(wō),“倭”、“户”也同声,这就是现在安多区藏族自称为“倭”(斡)而正与“华”(huá)暗声之证。“夏”字古音据黄氏切音,亥雅切音为“夏”(xià),举下切音为贾(jiǎ),今藏族称汉族为“贾”,也就是“夏”字的异读。就此我们可以看出古史上炎、黄是指传说时代,是汉语;华夏的名称则形成于周武王统一以后,是由羌语翻译而来,由族名递转为国名。顾先生听了大喜,命我续写成篇,并搜集整理自汉至清各代探察河源的资料。不幸“镇反”运动一开始,我竟被诬捕入狱,垂三十年,等我被释甫一年多,顾先生即归道山,临终前,还殷殷以重理旧业为嘱。基于这种我所从学的师友因缘,史先生在创办《中国历史地理论丛》之后,力促为文以竟未完之

绪。我也以为自 1978 年以来,党和政府制定改革开放政策,百事更新,国运昌盛,前所未有的,自己虽旧业久荒,也应不负时代使命和师友期望。而史先生则在这卅多年来,通过文献记载加上野外实地考察,举凡中国山川风土,草原沙漠,森林植被,以迄名城故关,均详审地进行了考证和论述,洋洋洒洒,编印了《河山集》五集,在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建设和研究上,卓然名家。同时于 1983 年发起组织成立了中国古都学会,提出建立中国古都学会的设想和建议,至 1988 年已定出七大古都,同时列为历代重要古都的约六十个,定为历史文化名城的近百个。如此众多珍贵的遗迹,构成了中华民族辉煌丰富的文化遗产。史先生又写了《中国古都概说》,提出了“中国古都学是研究我国古都的形成、发展、萧条或至于消失,或经改革成为新的城市的科学”的定义和其重要内容,并统计考察研讨了中国古都的数目及其年代,搜罗遍及偏霸及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小大并列,古今相及,至于纤细靡遗。而更重要的是他相继又发表了《中国古都和文化》、《论中国古都文化与当代文化的融通》两篇弘文,综论中国传统文化通过首都吸取域外文化,使古都文化更为丰富多采,诸如来自西域的音乐、舞蹈、绘画、戏曲、雕像等,从汉代起就陆续传入中土,丰富了中国人民的生活。而祆教、景教的传入,加强了中国与中亚各民族之间的往来,特别是佛教的传入,不仅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而且通过与中国文化的融合,使印度佛教有了新的发展。明清间通过西洋传教士传入了天文、历算和科学技术,更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内涵。而这种域外文化的传入和研讨以至改造活动,都通过首都而发扬传播到全国各地,使中国文化兼容并包,异采缤纷。在中西文化相互传播中最重要的一点,便是古今和中西文化的融通,而这种传播与融通,又都是通过首都进行和完成的,这就充分显示出了保护古都文化遗迹的重要性,并阐明了古都

研究所以在当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宏伟事业中成为新的学科的涵义所在。解放后北京由旧都一跃而为新都，这是据当时形势和北京所处的地位所决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首先开辟了天安门广场，树立了人民中国的崭新气象，但以后建设盲目发展，高楼林立，使故宫侷促于景山下，黯然失色。而市场与机关、工厂、民居混杂，失去了古都风貌，同时人口逐年剧增，不仅使交通拥塞，而且使水源紧张。今后在都市新的建设当中，如何从文化观点保护古都风貌和遗迹，就成了古都研究的特殊任务。史先生以研究传统文化的继承与更新为古都学的主旨，其任务至为迫切而深远。

最近史先生将十数年来有关研讨与保护古都文物风貌的论文，接纳傅璇琮先生建议，编为《中国古都与文化》专集出版，借以推动古都学研究和保护古都的迫切任务。书将付梓，他连续给我来信，切嘱为写一篇序文。我劫后余生，学殖荒落，难以应命，但固辞不获，因略述师承因缘，同门旧谊，借副先贤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的古训。史先生毕生勤奋，矢志于学，成就斐然。年登耄耋，兼患宿恙，仍矻矻钻研，由历史地理学发皇而创为古都学，令我不胜叹服。当年徐元文序其舅父顾亭林《历代宅京记》说：“先生夙语：‘必有体国经野之心，而后可以登山临水；必有济世安民之识，而后可以考古论今。’”把著作的旨义提高到体国经野，济世安民，真符合古人立言的本旨。那么史先生此书对当前游山玩水，舞文弄墨的时风，必将有所匡正并以之感发兴起了。

李得贤

1996年3月18日

自序

这本拙著，按照原来的设想，是作为《河山集》的第八集的。因为其中集中论古都，根据傅璇琮先生的建议，改名为《中国古都和文化》。研究古都所涉及的问题，不完全与历史地理相切合，却也有可以相互贯通的地方，因而书名也就有了改易。

十年前，中国古都学会在洛阳举行第三届年会时，我曾提议建立中国古都学，得到与会同仁的赞同。我当时曾为中国古都学规定了定义，指出：“中国古都学是研究中国古都的形成、发展、萧条或至于消失，或经过改革成为新的城市的科学。”并且指出：“这些都城在演变的过程中是有一定的规律的。中国古都学不仅研究这些古都演变的过程和现象，而且研究其中演变的规律，研究出这些规律以为当前建设的参考。尤其是在古都的旧址上现代城市的改建和扩建，其间还有一层因袭和革新的关系。”

研究古都首先是探索其遗址并加以确定，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保护和利用的诸多问题。不过这都是些初步的基础，还须有更多的致力。作为一个古都，在当时都应是其王朝或政权所统治地区的政治中心，也许还是经济中心或文化中心，其历年较为长久的，在传统的文化上更居有重要的地位。传统文化有的很有优越的地位，不宜使其中断或消失，这应是建设现代城市时不容忽视的问题。因而所建设的现代城市也应是具有自己特色的现代城市，不是其他各国的现代城市。

正因为是这样，中国古都学的内涵是相当丰富的。包括地理形

势在内的自然环境,首先是应注意的所在。这也是王朝或政权考虑建都的首要条件。如果都城容易受到攻击而难于防守,王朝或政权自然不易存在下去,其他就无从说起。现代城市的水源往往成为问题,可是往古之时,这已经成为选择都城的一个条件。《诗·大雅·公刘》篇记公刘选择都城时,是“相其阴阳,观其流泉”。显示其渊源所自。都城自是人文荟萃之地。都城有多少人口,才能繁荣起来,都城有多少物力,才能负担其所有的人口,这些虽未能都见之于简牍,却为当时后世多所关注。都城既是政治中心,又可能是经济中心。为了易于统治各地,又便于物资运输,交通道路是不可或缺的。远在周初就已经有见于此,而费力经营,《诗·小雅·大东》篇所说的“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就是具体的描述。秦始皇所筑的驰道和直道,更为古今所艳称。这是一项要政,历代都没有稍事放松,因而构成以都城为中心向四方辐射的交通网。时移世易,当时都城早已失去其本来的地位,可是这样的交通网络依然存在,有利于后来和现代的继续发展。也由于交通的便利,域外各国有时就纷至沓来,使其时的都城侧身世界名都之列。西汉隋唐的长安都可当之而稍无愧色,物资与文化的交流因之盛行一时。正是由于域外文化的输入,交流和融合就都成了问题,龟兹乐和于阗乐终于代替了中原的旧乐而擅声于当时的庙堂之上和里坊之间,而佛教也有中土的宗派。这些域外的文化和国内各地的文化,共同荟集于都城之内,共同构成其时文化的中心,自然各具其一时的特色。前后不同时期的都城络绎相连,因而也就显示出传统文化的次第相承,终于成为一体。这样在古都中存留的传统文化,如何与现代城市中的现代文化融合在一起,应该说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也是当前不容回避的问题。

我在中国古都学会中虽然提出建立中国古都学的意见,所作

的工作却是极为有限，结集在这本书中的也只有这十几篇文章。最初撰成的《中国古都学刍议》，本来已经编入《河山集》的第六集中，为了显示这一建议和具体工作的始末，如今移来置于这本书的篇首，以便前后能够贯穿起来，可是也就难免叠床架屋之嫌了。《唐代长安和洛阳》一文，本是为白寿彝教授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隋唐卷》所撰写的一章，因为是论述古都的文章，所以作为附录，列于篇后。

《中国古都和文化的文化》目录

序

自序

一、中国古都学刍议	1
(一)建立中国古都学的基础	1
(二)建立中国古都学的必要性	3
(三)中国古都学的意义及其范畴	6
(四)中国古都学的研究方法	21
二、中国古都概说	33
(一)中国古都学的定义及其主要内容	33
(二)中国古都的数目及其建都的年代	40
(三)历代的陪都	126
(四)古都年代综论	135
(五)古都的地理分布	164
(六)“七大古都”名称的确定	174
(七)小结	178
三、中国古都形成的因素	180
(一)形成古都的自然环境	180
(二)形成古都的经济因素	190
(三)形成古都的军事因素	196
(四)形成古都的社会基础	208
(五)小结	211

四、中国古代都城建立的地理因素	213
(一)探求国土的中心点	214
(二)利用交通冲要的位置	216
(三)凭恃险要的地势	219
(四)地理因素与对外策略	222
(五)接近王朝或政权建立者的根据地	227
(六)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的关系	232
(七)余论	236
五、中国古代都城建都期间对于自然环境的 利用和改造及其影响	241
(一)都城周围地形罅漏的补苴	241
(二)以都城为中心向外辐射的交通网的建立	247
(三)解决都城粮食供应问题的设施和策略 ——对于河流的利用和改造	254
(四)都城附近土壤的改良和重要农作物 种植地区的推广	269
(五)都城附近植被的维护与破坏	277
(六)小结	286
六、中国古都和文化	289
(一)古都文化为当代全国文化的汇集和代表	289
(二)域外文化的吸取,使古都文化更为丰富多彩	300
(三)古都的文化及其传播和影响	316
(四)小结	326
七、论中国古都文化与当代文化的融通	329
(一)都城形势的变迁与文化融通的延续	330

(二)古都文化的遗存与当代文化的融通·····	387
(三)古都文化对于当代文化的作用·····	418
(四)小结·····	423
八、中国古代都城的萧条与破坏 ·····	425
(一)政治变化的作用·····	425
(二)战争的冲击·····	435
(三)自然条件的变化·····	439
(四)民族关系的影响·····	444
九、唐代长安外郭城街道及里坊的变迁 ·····	451
(一)唐代长安外郭城的轮廓·····	451
(二)纵横于诸里坊间的街道·····	454
(三)里坊的分布·····	458
(四)里坊的规模及其坊墙和坊门·····	463
(五)里坊内的横街和十字街·····	468
(六)里坊内的曲巷·····	476
(七)里坊内的寺观·····	480
(八)小结·····	490
附录:一、唐代长安和洛阳 ·····	493
(一)隋唐两代以前长安和洛阳作为都城和陪都的 缘由·····	493
(二)长安和洛阳作为都城和陪都的规模·····	501
(三)强大的政治中心和繁荣的经济都会·····	512
(四)东西并峙交相辉映的文化中枢·····	521
(五)唐末迁都后的长安和洛阳·····	537
二、《中国古都研究》序 ·····	540

一、中国古都学刍议

自一九八三年成立中国古都学会以来，全国的古都研究工作者提出了许多论文，从各方面对历代的古都作了论证，成果相当丰硕。不过也应该指出，这些论文中也还有和古都关系不大，甚至没有什么关系的。为了今后能有更多的硕果，期望能在已有的成就上，建立中国古都学这样一门新的学科，作为中国古都学会的同志们共同努力的目标。

现在将有关的一些设想陈述于下，敬祈批评指正。

（一）建立中国古都学的基础

建立中国古都学在当前是有一些可资凭借的基础的。

我国历史悠久，古都繁多，自来就受到史家和学者们的重视。司马迁撰《史记·货殖列传》，论述关中的富庶，不仅追溯到秦国的雍、栎阳和咸阳几个古都，还追溯到周代的邠、岐和丰、镐。班固撰《汉书·地理志》，于前代都城皆一一注明，就是诸侯封国的都城也在所不遗。出于梁、陈之间或更后的人士之手的《三辅黄图》，所记载的虽涉及关中各地，而实以京师为主。其后杨銜之的《洛阳伽蓝记》、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吴自牧的《梦粱录》、李濂的《汴京遗迹志》等皆撰述于有关古都失去其都城地位之后。虽所撰述并未能详尽有关古都的全貌，一鳞半爪，亦弥足珍贵。而顾炎武的《历代宅京记》，更上起伏羲，下迄元代，缕缕细述，成一家之言。其他著作虽